

4月9日，法国作家波德莱尔诞辰201周年。
由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性文学衰微了吗？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何启示？

董强：文学没有药方也没有菜单



北大教授董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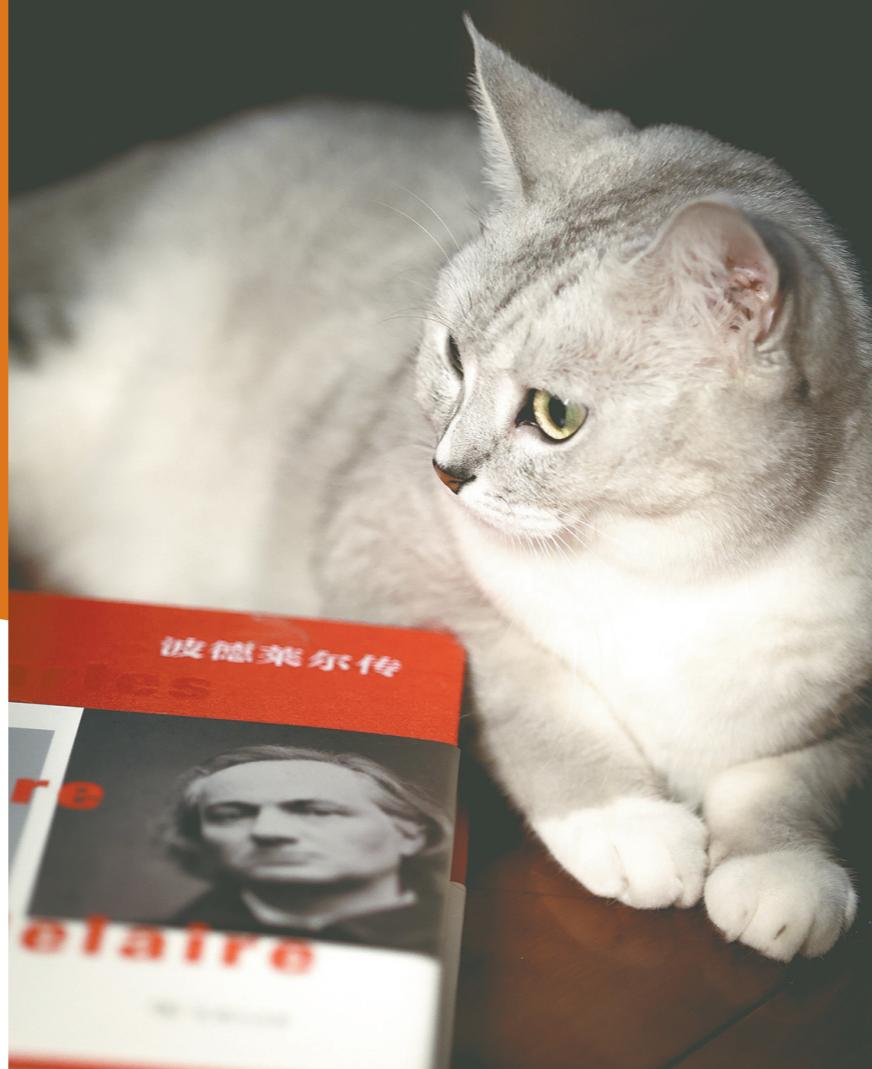
1821年4月9日，波德莱尔出生于巴黎的奥特菲依街13号。一生居无定所的他，却发现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新美学。

如果我们把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各种当代诗歌潮流视为一个分水岭，那么，由波德莱尔开创的“现代”或更确切说“现代主义”的时代，恰恰持续了100年。在这百年之中，波德莱尔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文学家。

商务印书馆推出由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创作、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翻译的《波德莱尔传》，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

由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美学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市场吗？今天我们读波德莱尔的时候到底在读什么？在强大现实主义潮流面前，现代派文学已经衰落了吗？带着这些问题，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董强——

□文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3 纯粹走西方道路是没有根的浮萍

羊城晚报：您在法国游学旅居十余年，其间能感受到波德莱尔留在这个国家的精神气质或者物质记忆吗？

董强：我在法国生活了12年，大概有10年来一直生活在巴黎市的中心区，生活条件虽简陋，但身边都是一些名人故居，一出门就是著名音乐家圣·桑的出生地，出门拐弯两条街就是波德莱尔的故居——巴黎6区的奥特菲伊街。

波德莱尔在巴黎留下了很多痕迹，因为波德莱尔一生居无定所，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都租房住。他把他的生父留下的钱都挥霍掉了，然后像巴尔扎克一样到处躲债，所以在巴黎很多地方都待过。走在巴黎街头，你会突然看到一个牌子，说这个地方波德莱尔曾经住过。

更多的是他留下的精神印记。一提到巴黎，很难不联想到波德莱尔。一个是他的诗歌很多都涉及巴黎，比如《恶之花》，它使波德莱尔成为现代巴黎最早的歌咏者。

羊城晚报：波德莱尔生前文学和艺术成就是在法国评价高吗？尤其是他的《恶之花》当时人们是如何评价的？

董强：波德莱尔生前，人们对他的诗歌、艺术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知道他更多是因为他的性格与众不同，甚至因为他吃了官司。他去世以后，法国的年轻诗人兰波、魏尔伦，包括后来象征主义最重要的一些大师都把波德莱尔看做最高精神领袖。到了19世纪末，波德莱尔的名声达到了一个峰值，他被公认为最重要的

第一位现代诗人。到了20世纪以后，本雅明等人在西方对波德莱尔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推广。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法国，李金发、梁宗岱等人都非常推崇波德莱尔，对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推广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

羊城晚报：波德莱尔的诗歌除了象征性，还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观照，但是后来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现代派诗歌好像很少能看到这种批判精神？

董强：其实波德莱尔生前并没有把自己看做象征主义的代表，更多是浪漫主义，当时雨果这些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波德莱尔被视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人、现代主义的第一人。同时，波德莱尔对现实、现代有非常敏锐的感受，刚刚萌芽的现代人的孤独感，在街上遇到的瞬间发生的事情等，他都能捕捉到，所以他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鼻祖。

但是后来承认波德莱尔艺术成就的年轻人，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他们都强调波德莱尔象征性、神秘的一面，并把这一点推崇到极致，忽略了波德莱尔对现实的关注。所以当李金发那一代人到了法国时，他们认为法国的诗歌就应该是这样，类似为了艺术而艺术，有点瞧不上现实。再后来，萨特等人再去读波德莱尔的时候，就看到了波德莱尔身上的批判性。所以一个经典作家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阐释的，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都能挖掘到不同的面向。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包括莫言、余华、格非等人，是不是也跟波德莱尔有关？

董强：这是肯定的，当时中国迎来外国文学的浪潮，中国作家大量吸收来自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包括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等。这些新的思想刺激着当时的年轻作家，因为原来中国是比较简单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后来就被西方涌入的文学的丰富性所吸引。但这种吸引不是纯粹

的模仿外国作家写作，更多是一种刺激，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年轻作家敢于创新，探索文学新的写法和形式。

羊城晚报：作家残雪曾说当时对西方的学习是浅层次的，所以导致后续无力，尤其是当时那一批先锋作家后来纷纷转向现实的怀抱。

董强：残雪的创作思路比较独特，甚至有一点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因为她受西方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她看来可能其他人对西方的了解没有她全面、深入，但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这个问题。当时西方

对中国年轻作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氛围，两种文化的碰撞刺激了他们的创作。但思想上的碰撞结束后，每个人肯定要走向自己的道路，每一个作家也有自己的创作方向。如果纯粹走西方的道路，也是没有根的浮萍。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翻译的作品，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创作能力其实还比较弱；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译作或者很少，那说明这个国家文化还是比较封闭的。这两者应该达到某种平衡，才能迎来真正的文化繁荣。

4 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性没有过时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波德莱尔对于今天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创作还有其意义和影响吗？

董强：这个也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学的创作都遭遇了一定的危机，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图像时代、互联网时代，甚至所谓元宇宙时代，这种现状正在破坏人们长期形成的文学阅读和表达习惯，这样就很难对文学这种精微的艺术进行深入的体验。而在十八、十九世纪，文学所占的重要性是现在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当下但凡对

文学还有一定的期待和信任，那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性肯定没有过时。无论是创作形式、题材拓宽还是对现实的观察，你会发现，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文学传统没有衰落，我们依旧需要从这样的源泉吸取经验和力量。

羊城晚报：今天来吸取这种经验和力量的话，跟以往相比会有什么不同的侧重点？

董强：一是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不仅仅是象征性和现代性，还要看到波德莱尔身上的现实性。更为重要的是，波德莱尔对都市中人的心灵的感受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

国当下这方面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还比较少。你会发现有点名气的诗人写的东西还基本是颂扬爱情、大自然一类的，即便是涉及都市生活，也没有特别深入的挖掘，包括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人的创作，大部分还是乡村题材，《废都》也不是真正的都市文学，更像是传统文人知识分子遭遇精神危机的小说。

当天下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诗歌还是长篇小说，都少有让人觉得特别震撼的作品，也许王安忆写的上海是特例，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羊城晚报：如何才能创作出好的都市文学作品？

董强：文学是没有药方也没有菜单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期待任何时代都有杰作涌现，文学评论者也只能说敲边鼓，尽量在土壤中加点肥料，希望看到更繁荣的创作。像我们做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也是怀着这种期待。

文学说白了就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和情绪，波德莱尔是最早把文学看作个人体验的

东西，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这一点一直强调不够，文学更多是一种你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个人化的东西。

羊城晚报：当下不少文艺评论家都倡导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一直在西方理论中打转，您是如何看待的？

董强：可以理解。但无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寻找自己的话语体系，终归还是要看能否写出好作品。我觉得至少中国现当代文学，证明了当时那一

代年轻人在西方文学思想的刺激下写出了好的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现在不可能回归到一个纯粹的传统中，因为当下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跟西方有着复杂的交织乃至重叠。当然，当下文学面临着危机和挑战，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需要面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从中汲取养分。

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又在作品中获得再生

熔铸个性焕发特殊美感

□苏军茹

在最近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军旅诗集《岁月青铜》中，刘笑伟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嫁接，透过一组组充满诗意的镜头，谱写了一支军队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英雄史诗，再现了一个民族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刘笑伟善于用诗的语言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车流滚滚，紫荆花在车轮绽放，一路疾行，一路花海”，这是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车队在行进；“在辽阔的、深邃的大漠戈壁疾驰，翻腾起隆隆的雷声”，这是朱日和阅兵的钢铁集群在集结……军旅诗可以有柔情，但绝不可少风云气，不可没有钢铁的音响和节奏。刘笑伟的诗关注大历史，记录大事件，激荡着战争与和平的华彩乐章，抒写着荡气回肠的英雄情怀。《雪山的重阳》《一首诗与一座雄关》《骑兵们》《描绘》莫不如此。《岁月青铜》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由坚定和刚健凝成的旋律，一种不熟悉的、别样的风景。这种猝不及防、动人心魄的冲击力，正如诗人所说，是“把每个字当成一颗子弹，子弹上折射青铜的光”。

刘笑伟对诗歌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感悟。在他眼里，语言是粮食，诗是酒，军旅诗不但要酿出军人的纯和浓烈，还要酿出军人隐藏起来的火焰，才能使自己的诗篇散发使人沉醉的香气。从战士到诗人，刘笑伟的诗始终凝结着军人的欢乐与困苦，交融着官兵的铁血与柔情。《岁月青铜》中，刘笑伟以其丰富细腻的情感体悟，敏锐深刻的观察想象和扣人心弦的笔墨渲染，将目光定格在青春燃烧的军营，字里行间充盈着激荡人心的英雄气。 “声音中的火焰瞬间光芒万丈，在这一刻，青春在奢侈地燃烧”，这是军营拉歌激情四射的呐喊；“听，骨节在劈啪作响，汗珠在皮肤上，擂响密集惊天的战鼓”，这是练军姿时时间和意志的抗衡；“队列里，战士们用手，摩擦着裤缝线，悬崖岩石滚落的声音，大海惊涛拍岸的声音”这是齐步走时属于军人的节奏与和声；“他早已与核潜艇融为一体，无声地穿透岁月，发出金属的光”这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奏响的青春之歌；“这就是我的老连队，里面住着我的青春”，就这一句，不知会叩开多少军人尘封的记忆闸门……

诗歌的构成要素是意象。意象入诗的目的和所要达成的效果，是以“象”征“意”，是暗示，是象征，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即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鉴赏军旅诗中的形象，重要的是要捕捉并理解诗歌中的意象。刘笑伟军旅诗中的意象，多呈现出一种奔腾耸峙、金石峥嵘的质感。

法国18世纪博物学家、作家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即人。

作家的创作是从融入到作品的环境中去开始的，他必须把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表现的情感熔铸在一起，也就是说，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又在作品中获得再生。《岁月青铜》正是如此。

评论家谢冕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翻开《岁月青铜》，满本都是雄浑的声音。”每一首诗都携带着深重的壮烈与苍劲，激发着昂扬的意志力和奋斗精神，使人获得特殊的审美感受。

书中140多幅画作极其唯美、惊艳，是第一套用中国抽象绘画语言完整描画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系列艺术创作

在四个维度上的真情对话

□祝晓风

打磨十年之久、新近面世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一书，厚重而新颖。文字作者徐立京，绘画作者徐冬冬。书中140多幅画作极其唯美、惊艳，是第一套用中国抽象绘画语言完整描画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系列艺术创作。王蒙先生评价：“它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早已具有却似乎沉睡良久、被遗忘被淡漠了上千年的精神珠玑，使它重新变得光芒四射，暖人心扉，生气洋溢。中国梦打造了又一个文化的柴扉，正大步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我们，连接上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法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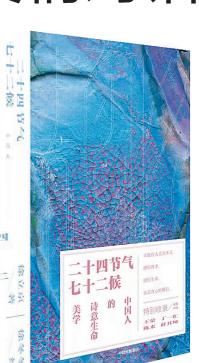
徐立京在自序中说：“追寻着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脚步，去体会天地之变、四季之变、生命之变，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了。日子不再以周计、以月计，而是真正以天计，在每一天的每一刻里，我都把身心沉浸天地变化里，看那远山，看那流云，看那街边的树，看那巷尾的花。不管是身在京城的繁华闹市，还是居于南国的滨海小城，我与自然、与四季、与自己的内心从未有过相融相知。”她写道：

“是那柔柔的碧水吗？树的色、花的彩都还是清浅的，这一汪水波却已经着实绿了。站在水边，远处烟波浩渺，近岸的水波绿如翡翠，在春风里温柔地荡着涟漪，泛着晶莹的波光，春水的碧绿似乎是此时世间最美的色彩，胜过了无尽的春花。”——这是一双慧眼中的春色。她从画作《惊蛰·初候桃始华》中，“看到了春之阳气震荡上行的宏大，看到了天地生明丽的动人，看到了万物初生的感动，看到了桃花开的柔美，更看到一颗对天地、对万物、对生命含情含笑的心”——这是一颗敏悟的心灵，读懂了另一颗敏悟心灵，读懂了画作中的丰富与深远。

写作者至少在四个维度上，与四个不同的对象在对话——

首先，与自然对话、与天地对话。该书观察、描述四季，贯通两条主线，一是天地阴阳二气的变化，二是天地对万物生命的仁爱。谁说天地不言？一个有仁爱之心的敏悟心灵，听到的都是天地仁爱之语。天地通过万物，无时不在于言。

其次，与画家的作品对话。对这些画作的品读，也成为写作



者感悟四季、感悟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重要源泉。徐立京不仅用优美的语言对画作的内涵做了充分的说明、阐发，而且在这一阐发中，又不仅仅限于作品本身；这些文字既与画作交相辉映，又自成体系，有完整的思想和形式；她是以自由独立的抒写完成了对话，同时也是以对话完成了自由独立的抒写。

再次，与经典对话。这几年作者认真研读《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和相关古籍，重新观察自然，体悟人生，发现这个文化体系之奇妙有趣，深为古人观察宇宙世界的细致精妙所震撼。

第四，与自己对话。徐立京的七十二篇正文，每篇都像一个人，独自站在旷野水边，喃喃自语，独自面对画作，仔细观赏，独自翻阅古籍，认真研读。我相信，她写这本书之后，与写这本书之前相比，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世界也会有很大的升华，内心变得更强大，原先已经很丰富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

散文写作也好，其他文学写作也好，贵在一个“真”字，一个“情”字。此书描述情景，生动逼真，引述经典，真实有据；写景状物，写树观花，笔端都饱含感情。唤起生命美感，在写作者是必需的，对读者则是额外的福利，而对散文创作来说，则是做出一个启示和榜样。它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的一条新路，即，用生活读活经典，用知识滋养散文，把对中华文化之爱熔铸在一篇篇美文之中，用个体的生命体验诠释中华古老的天地智慧，文字有明代小品文的清新淡雅，却又多出许多现代科学知识；有博物学随笔的广博，却又多出深沉的生命体验；在自然优美之中，又有着更多的历史感与多方面的融通。

2 打破中国人文对诗歌的理解

羊城晚报：波德莱尔对中国最热、传播最广的是哪个时期？

董强：主要是两个时代，一个是上个世纪三三十年代，以李金发、梁宗岱等人为代表，包括上海很多对都市书写、感官创作比较感兴趣的年轻作家；第二次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波德莱尔已经带上了存在主义的光环，郭宏安翻译了《局外人》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郭宏安还写了关于波德莱尔的很多的研究文章，对波德莱尔的解读此前已经有很多人的思考、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思考。

羊城晚报：波德莱尔对中国作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董强：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方面影响最大。无论梁宗岱还是李金发都看到这种象征，因为中国原本就有强大的象征传统，喜欢用隐喻、比喻来表达。然而，波德莱尔的象征与现代打破了中国人文对诗歌的理解，原来诗歌必须是善的、美的，但是《恶之花》让我们意识到诗歌还可以写恶的、丑的，这对当时的中国诗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是惊世骇俗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德莱尔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带有某种先锋精神，颠覆的同时又不排除中国诗人对古代的重新认识；但是波德莱尔现实的一面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